

中共新疆地方史丛书

中国共产党 库车县简史

中共库车县委史志办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共新疆地方史丛书

中国共产党 库车县简史

中共库车县委史志办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库车县简史 / 中共库车县委史志办公室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28-11941-7

I .中… II .中… III.中国共产党 - 地方组织 - 党史 -
库车县 IV .D235.4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69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10910
印 刷	新疆地矿彩印厂
开 本	787 × 1072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200 册
定 价	67.00 元

库车县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李 刚

副 主 任 玉素甫江·买买提 张新建 梁峰源

舒卫东 刘全山 张国领 彭 刚

刘 勇 热汗古丽·买买提 刘学坤

常务副主任 王凯旋

成 员 晁贵福 张文远 孙 博 晋景春

胡永兵 买买提明·阿不力孜

努尔买买提·阿不拉 常 华

罗清华 朱跃军 徐 刚 雷 庭

杨春林 李彦成 戴惠洲 廖 鹏

刘智勇 史新民 张团结 李海鹰

魏 忠 米热玩古丽·吾守 胡嘉祥



目 录

总序	(1)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在库车的革命活动	(1)
第一节 解放前的库车	(1)
一、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	(1)
二、社会与经济状况	(2)
第二节 共产党员林基路等人的早期革命活动	(6)
一、情系民众,改革吏治	(8)
二、兴修水利,发展城乡经济	(9)
三、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11)
四、开展抗日宣传与支前活动	(12)
五、以清廉作风惩治腐败行为	(14)
六、黎明前的黑暗	(15)
第二章 建党建政和民主改革	(19)
第一节 库车和平解放	(19)
第二节 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建立	(21)
一、成立地方建党、建政工作队	(21)
二、中共库车县委的成立	(23)
三、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员发展	(24)
四、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25)



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员 在库车的革命活动

第一节 解放前的库车

一、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

库车史称龟兹,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了当地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库车人民是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是为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人民。

1758 年,英雄的库车民众在首领鄂对的带领下,协助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864 年 5 月在库车大地上率先爆发的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较为典型的反封建农奴制的革命活动。这一活动点燃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官府和本地王公伯克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写下了 19 世纪中叶新疆人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不幸的是农民起义被反动宗教头目和封建主所利用,他们互相攻伐,你争我夺,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之后,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乘势入侵南疆地区,库车、布古尔(今轮台)、沙雅(时为库车南部的一大回庄)、拜城、乌



什、阿克苏(时含今温宿)等地失守。入侵后的匪徒滥杀无辜、横征暴敛,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1877年(光绪三年)9月,湘军统领刘锦棠奉钦差大臣左宗棠之命率兵收复南疆。库车人民积极响应,清军所到之处,维吾尔、汉、回等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军打仗,颇为出力”。每到一处,“凡搜缴马械,兼办粮草,侦控敌情,防守卡隘”等,均由阿訇(我国伊斯兰教称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伯克(清代天山以南城区官吏,品级不一,本意为“首领”、“头目”)率领维吾尔、汉、回等各族民众承办。军民同仇敌忾,大军气势如虹,在“数月之内,迅扫敌氛,穷追千里……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万”,库车、布古尔、沙雅、拜城、乌什、阿克苏等地相继收复。在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南疆的斗争中,库车人民的支援发挥了巨大作用。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残酷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库车民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1946年国民政府新疆和平谈判代表团飞临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三区”政府代表达成组建新疆联合政府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库车人民深受鼓舞,当地青年积极响应,在进步人士、知识分子艾则孜·玉素甫、阿不力孜·哈密提等人的带领下,迅速掀起与国民党驻军部队的抵抗活动,这场正义青年的革命活动,最终在10月下旬以寡不敌众告以失败,酿成了库车近代史上的“乌仑巴克惨案”。这一正义行径,为库车的民主解放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纵观新疆历史,尽管风云变幻,但生活在库车境内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都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社会与经济状况

库车历史悠久,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但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各族人民却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忍受着残酷



的剥削和压迫。

解放前,库车农、牧业经济并存,相互交织,58.8%的耕地被占人口总数 3.1%的地主、富农所占有,而占人口总数 96.9%的农民却只占土地的 41.2%,农区基本上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着比较完整的农奴制度。牧区则残留着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牧区与农区相比,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农牧民遭受封建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反动官府与地方军阀、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封建剥削往往同宗教负担纠合在一起,一些宗教职业者本身就是大地主、大牧主。维吾尔族、回族全民信教,使宗教剥削带有普遍性。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构成了库车境内复杂的剥削关系。土地和水资源掌握在王公和封建领主、伯克官吏、地主及宗教势力的手中,他们将土地按部落划分,而每个部落的首领都留一块最肥沃的土地归自己所有,贫苦的农牧民要为他们开渠、种地、收割,进行无偿劳动和服各种差役,此外还须定期向王公、贵族进贡,如每逢婚丧、朝觐及接待来往官员时都要向农牧民任意摊派实物。

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搜刮掠夺。巧立名目的各种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主要有公粮、采买粮、人头税、兵役税及摊派柴草、运粮送料等。当时,一个男劳动力每年需负担公粮100~200 千克,人头税不分男女老幼一年人均小麦 50 千克。剥削最重的是采买粮,名为买粮,实不付钱,迫使农民一年多次缴赋。1948 年,一户农民负担采买粮约 200 千克。

统治者“采买”的粮食,规定由农民自运,路途遥远,驴驮车拉,多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农民,步履艰难地挣扎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这些沉重的负担,往往使刚刚收获的农民便又遭断粮,出现因付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而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的局面。由于交通不便,地处边远偏僻的农牧民还要受商人盘剥。牧区的牧民,用 1 只肥羊只能向商人换回 3 挡子(约合两米半)花布或 1 块茶叶,用 4 只肥羊才



能换回1顶呢帽。一户牧民几乎每年要卖30~40只羊买口粮,卖掉50只羊买衣物用品,卖80~100只羊纳税,加上土匪抢夺、疫病、狼害,生活极度贫穷。库车是个富饶的地方,可解放前却经常发生粮荒,尤其是位于山林和戈壁边缘的阿格、塔里木等乡村更是灾害频发。在这一带的农牧民,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缺吃少穿,常以沙枣、桑葚、河鱼、鸟蛋充饥,以皮张蔽体,结草为屋。

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连年的战乱,使这里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依然处于原始状态。畜牧业主要是靠天养畜,无棚无圈,逐水草游牧;种植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春季撒种,秋季收获,牛马踏场脱粒,亩产不过60千克。极端贫困的生活使广大农牧民无法维持生产,被迫卖地卖畜,导致生产资料向少数富人手里集中。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牲畜、草场,大部分被封建王公贵族和牧主占有。只占牧户总数6%的牧主,却占有牲畜总数的30%到40%,最大的牧主占有牲畜近万头(只)。农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巴依(地主)、富农手中,占农区人口总数11.9%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的32.3%,且是上等好地;而占总人口36%的贫雇农却只有不足18%的土地,并且大都是土质瘠薄的下等地。这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合理性,是导致农牧民群众贫穷的原因之一。

其次,库车为灌溉农业,封建地主对水利的垄断程度甚于土地,水租剥削比其他租佃关系的剥削更为残酷。地主、富农、封建王公和寺院长期霸占水源,以此压榨、吮吸、鱼肉农牧民。如哈勒喀村,解放前拥有灌溉条件的土地,几乎80%被地主占有,农牧民的土地大多数处在干旱与荒芜之中。水霸们还依仗权势剥削农民,每到浇水季节,地主恶霸指派大小水官配水,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穷苦农民万般无奈,每次浇地还要备足粮、油、肉上贡打点。农民无法逃脱水霸们的束缚,只能让他们任意摆布,无理征收,甚至连无地农户也要每年向他们缴纳部分生产资料作为生活用水费。

手工业、商业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战乱频繁,仍停留在小作



坊和小商栈的状态。煤炭生产设备简陋,产量极低,只用于铁匠烘炉,居民仍用红柳等其他燃料做饭取暖。

这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合理状况和任意盘剥的社会制度,致使广大穷苦农牧民始终处于被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几乎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

社会进入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不但没有改变剥削行为,反而处处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人民群众实行残暴统治。他们除了推行保甲制外,还利用宗教麻痹和奴役人民群众,下设特务组织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一些地主恶霸、封建王公还依仗权势,私设公堂,滥用各种刑具,随处欺压百姓。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被压迫、被剥削之中。

广大贫苦农牧民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压迫。地主、牧主、恶霸可以恣意打骂、监禁甚至杀害农牧民,霸占民财,蹂躏民女。解放后土改时被库车县人民政府镇压的恶霸、地主达 1.1 万多人。宗教的统治和盘剥更是压在广大贫苦农牧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解放前,库车有清真寺 600 多座,宗教把持者利用宗教特权和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人民。清真寺占有的土地(瓦哈甫地),由教民无偿代耕,收成如数交给寺院。每逢“庙会”、节日或婚丧嫁娶时都由阿訇主持念经,教民付酬。宗教法庭更为残酷,它可以任意向无辜百姓动刑。

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上水旱、风沙、病虫等自然灾害的不断侵袭,造成库车通货膨胀,市场冷落,商品稀缺,物价飞涨,农牧业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缺吃少穿,经济十分萧条。据 1941 年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库车工商业仅有 1763 家,其中土产商 345 家、杂货坐商 255 家、理发馆 3 家、澡堂 5 家、典当铺 6 家、面食房 51 家、饭馆 29 家。手工业作坊多临街设店,自做自卖。

1949 年,全县社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折人民币计算)为 2143.42 万元,其结构是:农业占 53.56%,手工业占 41.1%,建筑业占 0.68%,商



业占 4.19%，运输邮电业占 0.47%；按农、轻、重产值比例计算，农业占 62.02%，轻工业占 36.08%，重工业占 1.9%。国民收入 1361.96 万元，人均 91.44 元。

1949 年，库车仅有耕地 40 余万亩，种粮作物 34.78 万亩，粮食总产 2050.85 万千克，平均亩产 58.97 千克；种棉 4.3 万亩，棉花总产 25.75 万千克，亩产（皮棉，下同）5.99 千克；种油料 3 万亩，油料总产 81.8 万千克，亩产 27.25 千克。畜牧业生产也很落后，常有疫病流行。全县牲畜存栏仅 23.46 万头（只）。当时，人均占有粮食 137.7 千克，棉花 1.73 千克，油料 5.49 千克。仅有的这点产品，绝大多数还被剥削阶级占有。贫苦农民常常是“半年桑杏半年糠”，或以猎物和酸奶疙瘩果腹。遇到天灾，则田园荒芜，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在反动封建统治的漫漫长夜里，广大农牧民期盼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那一天。

第二节 共产党员林基路等人的早期革命活动

抗战时期，新疆是中共中央和苏联联系的交通要道。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动员和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建设抗日后方战线，进一步发展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于 1938 年初，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院，选派了两批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其中到库车来的有林基路、陈茵素、蒋连穆 3 名共产党员。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 年 4 月 17 日出生，广东省台山县人，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大学文化程度。1933 年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派赴日本领导中国留日学生运动；1937 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同年 10 月参加延安中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由党中央派来新疆工作;1939年6月到库车任县长(在疆期间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地区教育局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1942年9月1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被害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7岁。他以自己革命的一生,谱写了一曲献身祖国、献身人民的壮歌。

陈茵素(原名陈文瑛),女,林基路夫人。1939年9月,由延安前往迪化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10月~1942年5月随同丈夫林基路在库车县工作,期间任库车县小学教师兼妇女联合会主任。

蒋连穆(原名蒋春茂),于1939年1月~1942年1月,同林基路、陈茵素在库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任库车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进驻库车的三名中共党员于1939年9月,秘密召开了由林基路主持的第一次党小组会议,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三不公开”的指示原则(即,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政治身份,不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以地方公务议事的形式组织召开。作出了借盛世才“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积极团结、教育和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开展党的地下抗日救亡工作,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会议决定。陈茵素协助反帝会库车分会,负责做好妇女的抗战思想发动工作。

当时,这三位中共党人,在驻新疆中共代表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等人的领导下,不畏艰险,紧密团结,分工合作,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当地进步人士紧密联系,执行六大政策,宣传抗日,兴办水利,改善交通,整顿财税,发展生产,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减轻人民负担,给库车带来一时的生机。他们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用顽强的意志和聪明智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使命。



一、情系民众,改革吏治

林基路于1939年6月22日到库车任县长,他到库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察访民情,释放无辜群众。林基路到任后,发现有不少平民被关在监狱里,他们的亲人日夜守在县政府旁,强烈要求申冤。鉴于这种情况,林基路下定决心对此事加以过问。由此,到任后的他开始走上了一条共产党人伸张正义,为民作主的不悔之路。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这些所谓“冤狱”的真实情况。从而,审理冤假错案,平息民心的工作由此开始。他不分昼夜的工作,亲自调阅案件记录,直接与知情人和狱犯谈话掌握情况,判别案情。经过核查,他发现被压的狱犯中,有不少穷人是受地主巴依陷害的。经明查,林基路将70多名无辜受害的平民当即开冤释放。释放的平民出狱时,一个个都感到特别好奇,怎么官府还没从他们身上榨出一点油水来,就破例放人了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位林县长是八路军里来的,八路军的官,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替穷人说话办事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由此开始悄悄地凝聚广大贫苦百姓。林基路明白,要想打开局面就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赢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于是,林基路开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将着眼点先放在了被群众称谓“仓老鼠”的“平斗出,尖计入”的田赋粮上,向剥削行为开刀,废除了这项群众反对的税赋制度。并大刀阔斧地整顿县衙,撤换了一批代表地主利益的、不称职的官吏。对民愤极大的一名警察作了重判,将70多人的“政务警察”机构削减为12人的精干队伍。同时,还培养和提拔了一批正直可靠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官员。一位受群众拥护,名叫依米尔的维吾尔族同志就是被提拔者之一。林基路将这位正直可靠的少数民族同志与共产党员蒋连穆一同任命为县财政局副局长,把全县的财政工作赋予他们管理;同时还委任县政府的狱员许士杰为县府秘书,教员石青



山为民政科长,马聚奎为小学校长,曹延玺为教育科长。并对以前县政府形成的腐败人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县政府直接任命的区、乡、街长和“米拉甫”一律革新为民主选举,坚决惩办行贿人员。通过整顿,撤换了群众反映强烈的6个街长和4个乡长,建立了总衙长办事处。整顿后的县政府,从县长到科员、办事员,包括警察、马夫在内共32人,形成了一个廉洁、精干、高效的政府工作班子。

林基路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化解矛盾。为了正确处理好牧耕税收关系,他与蒋连穆等人在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的情况下,于1940年5月向新疆省财政厅呈报书面的调查建议书,建议省厅结合当地实际,将“从事牧业兼耕作的农户,凡兼种50亩田者,豁免牧税牛二马一,以促农牧共同发展”。此建议于1940年6月17日得到新疆财政厅毛泽民厅长批准后,付诸实施。

整顿吏治和税收改革措施的实施,赢得了全县人民群众的拥护,由此大家一致称赞,说:“县里来了个林青天,库车从此变了天。”由于林基路处事公正,办事认真,赏罚严明,由此,深受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

二、兴修水利,发展城乡经济

1939年8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任县长的第二个月,他从群众利益出发,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穷苦农民的饥饿问题,他带领群众,兴修水利,造福人民。当年,组织群众修筑农田灌溉干渠60条,支渠108条;同年8月,库车城铜厂河(即库车河)洪水泛滥冲毁城乡大部分道路、桥涵和农田,给库车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目睹了这一情景的林基路,决心化水害为水利。他带人沿河实地考察,并向有丰富经验的农牧民和水利技术人员请教,亲自参与设计方案,精心组织施工。1940年6月,林基路调集2千多名民工开工建设,短短几个月,全长3千米,底宽3.5米,高5米,顶宽1.5米的

铜厂河石堤(今北山龙口苏巴什大坝,该堤分东西两段)胜利竣工。与该坝同时修建的还有九区(今牙哈镇)博斯坦托乎拉村一条长约40多米的防洪坝。两座堤坝筑成后,变害为利,既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农民收入,又遏制了洪水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由此,科学利用自然资源,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得到了推广应用。后来,库车人民为了纪念林基路,将此堤坝命名为“林基路大坝”。

林基路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己任。上任后的第三个月,他就号召人民开荒造田,扩大种植面积。为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采取三年免征田赋税措施,在短时间里有效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1940年秋,库车七区(今哈尼喀塔木乡)干旱,数万亩草场因缺水而荒芜,他亲自去查看灾情,决定引塔里木河水灌溉培育草场。1941年4月,他组织七区农民开工挖渠,建成两条引水灌渠,有效地解决了七区的旱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条件。同时,对道路、桥梁也进行了整治。

龟兹古渡大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当时连接南北疆交通干线的重要桥涵。该桥自1928年修建后,历经11年之久,屡经山洪冲击,桥梁倾斜,即将腐朽倒塌。林基路发现这一情况后,决定重建此桥。在建桥过程中,他邀请能工巧匠把脉,亲自参与图纸设计,组织成立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建桥委员会,并动员工商界及富户人家捐资赞助。在他的号召下,仅工商会成员自愿捐资工程费达1.7万余元。时隔不久,一座独具民族风格的新桥在他的领导下建成。大桥建成之日,民众载歌载舞前来庆贺,并要求以林基路的名字命名。林基路谦逊地笑着说:“不,友谊之桥,千载古渡,各族人民劳动硕果,不可以我而名。”遂挥手而书,“龟兹古渡,团结新桥”八个大字。该桥因1958年南北疆交通干线改道而变为县城公路桥涵。

为制定长远规划,拓宽发展空间,从1939年6月~1940年5月,林基路骑马跑遍了全县各地。他带人先后利用四个月的时间深



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发展库车县农牧区生产的长远规划,绘制出县域地形图。同时,还结合在库车铜厂村调研时,发现大量油质物在河流中漂浮的现象,对当地自然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探究。为弄清含量品质,开发利用资源,他专程从外地请来专家,对采集的 300 千克原油进行提炼,并根据专家意见对这一资源采取保护性措施,为日后库车油气的大开发做了准备。

在林基路等共产党员的治理下,库车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民国 30 年(1941 年),全县耕地由民国 28 年(1939 年)的 20.01 万亩,增加到 49.08 万亩;全县粮食、油料、棉花、草料、畜牧等农业经济都得到成倍增长。农贸市场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工商业户由民国 29 年(1940 年)的 600 余家上升到民国 30 年(1941)的 1763 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远销县外与内地的大、小皮衣、皮帽等手工制品达几十万件;土大布 4~5 万匹。杏子、杏干、杏仁、酸梅、土肥皂等干果和日用品产量近 10 吨。

三、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担任县长后的林基路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当他发现许多适龄儿童无学可上的情况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在走访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三种途径解决办学问题:即,国家办学(由政府出资办公立学校);社会团体办学(如维文会、汉文会出钱办学);依靠社会捐助办学。为提高群众对教育工作的认识,1940 年春,林基路还发动了一次劝学运动,亲自带队深入农户开展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使当年辍学的大部分学龄儿童重返学堂,部分成人也参加了扫盲识字班。

1939 年 8 月,林基路主持召开工商界人士会议,动员工商界人员捐资办学。工商会会长瓦哈甫带头响应,出资 1.5 万元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教学楼,供附近学龄儿童念书。在他的影响下,工商界人士那斯尔·自尔、尤努斯阿訇等人也纷纷捐款助资办学。



当年,在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一座设有 12 个班级的学校,极大地促进了库车教育事业的发展。1940 年 6 月 14 日,以工商会会长瓦哈甫为首的工商界捐资助学人士,受到了新疆省政府的传令嘉奖。

林基路对生活在库车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尤为关心。1939 年 11 月 2 日,当他得知生活在库车北山大尤都斯的 18 户柯尔克孜族牧民因无草场放牧、子女无学校读书的情况后,当日就派遣秘书许世杰、公安队副队长苏来满到实地调查了解。在掌握实情后,他当即批准柯尔克孜族牧民在大尤都斯建立一所公立牧民小学,让适龄儿童入学读书。生活在深山放牧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地拥抱、高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学校!”林基路还要求学校每周开展一次抗战文艺活动;并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水利、修路、建桥工地演出,为广大农工传播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维护民族团结、开展抗战救国的进步思想。

1938 年,库车县共有小学 16 所,其中公立 1 所。到 1940 年,全县公立、会立学校发展到 49 所,其中,公立 5 所,女子小学 8 所。

林基路小学是 1939 年由林基路烈士在库车任县长时,在原第四国民小学的基础上改(扩)建的一所小学,烈士夫人陈茵素女士曾在校任教,当时是维吾尔、汉合校。1976 年,为纪念林基路烈士,将学校命名为林基路小学。

林基路担任县长期间,大力发展库车的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各族知识青年,为库车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培养人才的基础。

四、开展抗日宣传与支前活动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林基路借“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贯彻实施,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亡积极工作。革命的信念在林基路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动摇过,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一刻也没有忘记过。林基路到库车